

续表

国家	公司	行业	国家 所有权 (%)	分红政策	国有股份 红利获益人
主要的国家持股基金					
奥地利	OIAG 基金	战略性	100	2004 年 90% 的利润收入作为红利支付, 私有化收入必须 100% 上缴国家	财政部
捷克	国家财产基金	战略性和资产组合	100	基金账面表明以预算支持和补贴的形式支付给各类国家部门和实体的总额可能已经达到盈利的 100%	各类政府基金
新加坡	淡马锡基金	战略性和资产组合	100	过去 30 年中, 支付给财政部的红利平均为国有股份市值的 7%	财政部

注: 资料转引自高路易 (Louis Kuijs)、高伟彦 (William Mako)、张春霖著《国有企业分红: 分多少, 分给谁?》, 世界银行政策建议, 2005 年 10 月 17 日。

国有企业应该把税后利润的多少上缴给国家? 按照西方的理论, 由于国有企业属于一种公众信托, 因此, 来自 OECD 国家的官员们建议, 对国有企业剩余现金留存比例应该有更严格的标准。例如, 一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高层官员认为: “对于一个国家百分之百控股的国有企业来说, 合理的分红政策是将其全部利润都用于分红, 除非这家公司能够表明, 在考虑风险的情况下, 它仍然有可以带来合理回报的投资机会。”^① 通过上面的案例, 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不同国家的实际分红政策有较大区别。如在新西兰, 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在与政府部门协商后, 根据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未来的投资计划和盈利前景等因素来制定分红政策; 而挪威和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国有企业董事会则设定了多年度的目标分红率, 随着商业周期的变化而调整分红率, 如整个商业周期预期盈利的 33%、50% 或者 67%。根据 Yahoo Finance 的公司报表来看, 美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公共事业企业的平均分红率为 46%, 即使低增长的公司的平均分红率也达到了 40%。

① 高路易 (Louis Kuijs)、高伟彦 (William Mako)、张春霖: 《国有企业分红: 分多少, 分给谁?》, 世界银行政策建议, 2005 年 10 月 17 日。

关于中国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比较研究*

怀默霆

自中国 1978 年推行市场化改革以来, 中国公民的贫富收入差距在 30 多年里急剧扩大。毛泽东逝世 (1976 年) 时, 中国无人拥有巨额财产或可以靠继承财富生活。当时的最高月收入约为 800 元, 而新工人的月收入只有 30 元 (大多数农村公社社员收入更少)。这样的收入差距虽然大, 但与中国现在的收入差距状况截然不同。如今, 仍有少部分中国人 (将近 1 亿) 身陷贫困, 而中国已经有 100 多万个身家超过百万美元的富翁和 200 多位亿万美元富豪^①。富有的企业家和房地产大亨住的是富丽堂皇的豪宅——有些豪宅完全是欧洲宫廷的翻版; 他们的子女开的是法拉利、玛莎拉蒂或兰博基尼跑车, 闲暇时打打马球, 经常在夜总会一掷千金, 一晚上的开销超过普通城市家庭一个月的收入。部分高干子弟也过着特权生活, 除了吃喝玩乐, 更多地表现为就读于外国名牌大学, 或经扶植进入商界和政界精英圈。

面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 尽管中共领导人也是潜在的受益者, 但十余年来, 这些领导人已经针对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稳步扩大发出了明确的警告, 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社会平等的计划。邓小平时期推出的市场改革主要偏重沿海地区和城市,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 江泽民 (1989 ~ 2002 年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 在 2000 年启动了 “西部大开

* 由 Dong - Kyun Im 协助研究。文章收入本书时较英文原文略有修改。

① 然而, 中国今天的收入不平等不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结果。中国经济 30 多年来的蓬勃发展提高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生活在国际公认贫困线 (每人每天 1.25 定值美元) 以下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 60% 左右降至今天的 10% 不到。但中国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没有富人那么快。

发”，通过国家拨款和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大力发展中国内陆省份。继江泽民之后，胡锦涛（2002～2012年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旨在改善中国最贫穷地区，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命运。在胡锦涛与继任者习近平交接期间，中国政府于2013年2月4日宣布了旨在缩小中国巨大收入差距的重要新举措^①。

下面我们将简要探讨这一历史时期引发的几个问题。

（1）改革期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呈怎样的发展趋势？

（2）如何从比较的角度看待这种趋势？

（3）过去三十多年间，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原因是什么？

（4）过去为扭转这些趋势、促进社会平等所做的种种努力为什么不是很成功？新举措能带来改善吗？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几点需要先做澄清。这里的讨论重点自始至终都集中在中国国民家庭收入分配的问题上。然而，在所有社会中，特别是在中国，还存在很多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如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受教育机会、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平等），有些的不平等对家庭幸福的影响可能比收入更大。例如，在1978年的时候，虽然中国的收入差距与其他社会相比可以说是处于很低的水平，但很多生活必需品当时都由国家分配，而不是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所以，收入高并不会让你拥有太多东西。同样，月工资看似微薄的国家领导干部却可以免费享用专门为他们修建的疗养胜地。城市工人享受福利分房以及各种待遇和补贴，这些东西的价值已经超过其微薄的月薪；而占当时人口80%的农村公社社员则完全享受不到这些福利，他们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既不能迁走，也得不到城市居民享有的政策优惠。虽然自1978年以来，市场化改革已大大减少了国家直接分配，并突出了家庭收入的重要性（同时人口迁移再次成为可能），但在中国社会，国家分配和市场分配仍然以各种形式并存，行政级别和关系（而非收入）仍然非常重要。

过去30多年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呈怎样的发展趋势？与其他国家相比情况如何？本文以现有的各国家庭净收入分配数据为基础，用综合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计量范围是从0到1，0=完全平等，1=完全不平等。

^① Chris Buckley:《中国公布缩小收入差距的提案》，《纽约时报》2013年2月5日。

图1显示了既定时期内中国及其他部分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发展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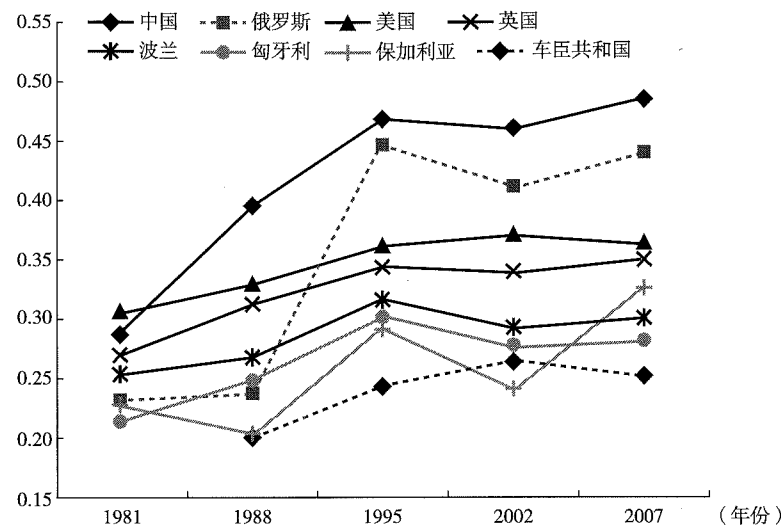


图1 家庭净收入不平等趋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2002年及2007年数据来自Li Shi、Luo Chuliang和Terry Sicular的文章《中国收入不平等及贫困概述（2002～2007）》，载于Li Shi、Hiroshi Sato和Terry Sicular主编的《不平等现象在中国愈演愈烈：和谐社会的挑战》（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第44～84页。1988年和1995年数据来自Björn Gustafsson、Li Shi、Terry Sicular和Yue Ximing的文章《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与区域间差异（1988、1995和2002年）》，载于Björn Gustafsson、Li Shi和Terry Sicular主编的《中国的不平等和公共政策》（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第35～60页。1981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共享收入增长：中国的收入差异》（华盛顿：世界银行，1997）。

其他国家：Frederick Solt,《规范的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社会科学季刊》90（2）（2009年6月），第231～242页，采用SWIID数据库（2011年12月，版本3.1）最新更新数据。

先看中国的情况。在图1中所示的第一年（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28。自1981年以来，中国基尼曲线一直稳步急升，尽管有一段时间（1995～2002年）相对趋于平稳（基尼系数约为0.46），但总体仍呈急剧上行趋势。然而，到了图1中所示的最后一年，即2007年，收入不平等现象重现抬头之势，当年的基尼系数约达0.49^①。这属于相对较高的收入不平等

^① 由一支国际协作团队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和2007年开展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是质量最高的中国民众收入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重现抬头之势，这一趋势在Li Shi、Hiroshi Sato和Terry Sicular主编的《不平等现象在中国愈演愈烈：和谐社会的挑战》（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中有详细论述。

水平,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以及图1中其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指标。然而,0.49的基尼系数仍然低于未显示在图1中的许多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高达0.50以上,甚至超过0.60^①。

中国2007年以来的收入分配趋势目前尚不明确,而且存在争议。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发表的一份2013年报告显示,中国2005~2009年的基尼系数稳定在0.49左右,随后稳步微降至2012年的0.47左右。^②然而,另一组研究人员于2012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却显示,中国2010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61,这会使中国登上或逼近全球基尼系数排行榜的头名位置。^③无论这些争议最终如何定案,中国在这方面的主导趋势都是明确无疑的: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经历了异乎寻常的急速恶化,目前的贫富差距水平在各国排名中高居前列。

整体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中国的急剧恶化究其原因何在呢?常见的解释有以下几种。首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收入差距会先扩大然后再缩小,这是一种可预见的必然趋势。他们援引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55年的研究来支持这种“倒U形曲线”轨迹理论。该理论基于这样一种设想:最初,一部分农业人口放弃务农,转而从事更加高产、收入更丰厚的工业劳作,这将扩大收入不平等现象;但等到大批农民都已离开农村、城市中产阶层已经发展壮大、农村人口相应减少、农村收入开始上升,整体收入不平等水平最终就会出现下降。

然而,用倒U形曲线的上升部分来解释中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新的跨国研究显示,随经济发展而不断演变的收入不平等

趋势并没有固定的倒U形轨迹可循。^①而且,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经历也否定了库兹涅茨假说。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都因实现了“平等增长”而备受称道。尽管三地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近年来普遍有所加重(见图2),但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其贫富差距非但没有扩大,在某些时期反而还有所下降。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收入不平等趋势比较接近“U形曲线”,而不是“倒U形曲线”。^②因此,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同样可以伴随收入不平等状况的相对平稳乃至逐步改善,而不一定会像中国那样出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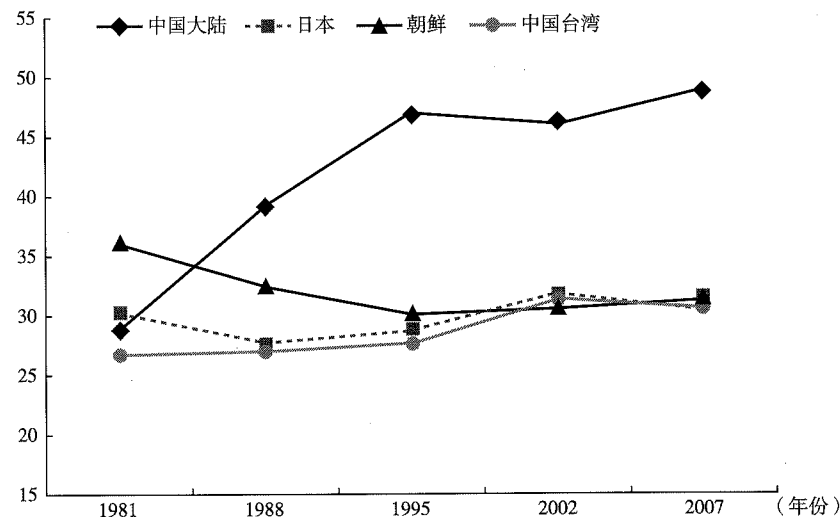


图2 家庭净收入不平等趋势：中国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对比

资料来源：同图1，但台湾2007年的数据采用的是SWIID数据库中2005年的数据，因为2007年估算数据无法获得。

① 在同一时期,其他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后社会主义时期的越南)的基尼系数估值(摘自同一数据来源)通常在0.30至0.39之间,没有出现中国这样急剧上升的现象。

② 见 http://www.china.com.cn/zhibo/2013-01/18/content_27692231.htm?show=t, 具体来说,马建堂给出的基尼数据如下: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他声称收入分配有所改善主要是因为自2007年以来农民收入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更快。

③ 见 Ernest Kao 的文章《中国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南华早报》2012年12月10日。

① Roberto Korzeniewicz 和 Timothy Moran:《关于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理论与社会》34(3)(2005年6月),第277~316页。他们驳斥了库兹涅茨的研究——《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美国经济评论》45(1)(1955年3月),第1~28页。显然,高度工业化国家近年来的趋势也背离了库兹涅茨的假设。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水平重现上升趋势,由此显现出“横S形”的长期发展轨迹。

② 联合国:《公平增长:一些亚洲国家政策的经验教训》,(纽约:联合国,1999);Wang Feng:《公平增长的终结?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亚太问题》第101期,(2011年7月),第1~8页;Eunju Chi 和 Hyeok Yong Kwon:《东亚不平等的新兴民主制度:韩国和中国台湾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及政府对此作出的反应》,《亚洲调查》52(5)(2012年10月),第900~923页。

其次,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不断恶化的原因,另一种常见的解释就是这种现象是由中国从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日益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改革所造成的。这种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私有财产、继承财富、资本家利润和外国剥削发挥不了任何作用,生产和收入由国家集中管理,以满足公民的需求——用列宁的话来说(摘自《国家与革命》)就是“人人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然而,集中计划经济的废除,私有财产、资本家和外国企业的涌现,以及对利润的报复性追求,都不可避免地扩大了贫富差距。

然而,将中国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日益加剧归咎于社会主义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改革也不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观点。第一,正如本文开头所述后社会主义过渡的文献中解释的那样,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系统化地推动平等分配,而是采取政府指令性分配的做法,事实上,社会主义官僚往往会制造出严重不平等的社会,尽管不平等的方式有别于资本主义。^①那么,后社会主义过渡是否会扩大收入差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又会扩大多少?回答这个问题要用事实说话,而不是单凭一句“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就能得出结论的。第二,否定这种解释的第二个原因是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经历。很多脱离了苏联集团的国家都经历了后社会主义过渡,图1包含了其中的几个国家。尽管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都经历了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俄罗斯可能例外(这一点十分重要),但它们既没有像中国一样出现收入差距的急速扩大,也没有达到中国那么高的基尼系数水平。^②换言之,虽然一个经济体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似乎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扩大,但这种转型过渡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基尼系数为何会一路飙升到如今的水平。

如果中国近年来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是集中计划经济向市场分配的转型造成的,那还有什么更可信的解释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充分认识中国与本对比研究涉及的其他社

① 见 Ivan Szelenyi 的《国家社会主义下的城市不平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一书中的讨论;Martin King Whyte:《社会火山之神话》(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0)。

② Branko Milanovic 和 Lire Ersado:《改革与过渡时期的不平等:对1990~2005年家庭样本调查数据的分析》,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2010/62号工作文件(2010年5月)。

会的重要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不平等模式的影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模式往往体现为社会各阶层和各政党及其游说集团之间的竞争,民主政府迫于压力,或增加富人向穷人的财富再分配,或在某些情况下制定有利于富人的政策。这种情况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推行的仍然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中共竭力阻止富人和商业利益集团——甚至也包括穷人——公开组织起来主张自己的利益。自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作为发展型国家,致力于根据中央制定的政策加快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实力(在这个过程中,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

要解释中国的情况,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可能更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专制政权的统治下(日本则是作为一党主导的发展型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没有采取多少措施去推动财富向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再分配。如果说专制独裁的政权性质使得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相对而言没有遭受来自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压力,那么它们是如何实现“平等增长”的呢?

早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倡导出出口之前,日本在1868年后的明治维新时期就实施了体制改革,废除社会等级壁垒以促进普通公民平等,强调通过普及现代教育改善人力资本,并大力投资推动电气化、交通运输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此外还采取了其他相关措施,旨在把每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同时培养他们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的能力。尽管20世纪上半叶日本殖民统治者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犯下了滔天罪行,但他们在这两个殖民地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来改善人力资本和健康状况,并将殖民地人民纳入当地乃至日本的经济秩序之中。

20世纪50年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先驱,此时的日本已经具备了上述结构性先决条件,确保了日本制造企业的经济成功能够迅速蔓延至其他经济领域和行业。^①这样的历史背景意味着日本最大限度地弱化了二元经济特征。二元经济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经济特征,即接轨全球市场的小规模独立型现代经济与大规模自然农业经济同时存在。领先工业企业

① 20世纪40年代末及50年代推行的全国土地改革也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公平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的经济成功产生了广泛的关联效应：业务需求延伸至分包商，日益增长的劳动力需求促使劳动者频繁流动，最终导致工资上涨。同时，劳动者离开流水线自己开办小企业的机会也大大增加。

换言之，有了紧密融合的国民社会、市场以及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以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成功转化成了有效的经济纽带，借“涓滴效应”逐渐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即使在政府偏帮商业利益集团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当中国台湾和韩国成功复制日本的发展战略时，商业成功带来的效益也迅速渗透到了融合紧密、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广大民众之中。

中国大陆自1978年以来基本上遵循了与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相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消费品制造业。既然如此，那中国的收入分配趋势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呢？一部分原因是，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多样、人口众多，因而很难实现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的民族融合和“后向联系”。但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在1955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留下了后遗症。有点矛盾的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本来是相对较轻的，但中国实施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后来却成了绊脚石，阻碍了它像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形成有效的经济联系，并让商业成功带来的效益扩散开来。

要解释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简单回顾一下早年有关毛泽东时代经济的争论是有帮助的。经济学家 Audrey Donnithorne 把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体制喻为“蜂窝经济”。她指出，与苏联相比，作为农业社会的中国要推行集中计划经济就必须克服更大的困难，再加上1957年以后的行政分权和“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的破坏，各省、市、县，甚至公社都强调自力更生，因此大多数经济交流局限于本地，各行政区域互无经济往来。换言之，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的经济一体化与苏联或市场经济社会相比较为薄弱，中央政府掌握的资源有限，无力改变这种各自为政的“蜂窝状态”^①。

① Audrey Donnithorne:《中国的蜂窝经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趋势》，《中国季刊》52（1972年10月），第605~619页。

Donnithorne 的观点和证据遭到了 Nicholas Lardy 的强烈质疑。Lardy 利用有关工业投资与发展模式的证据证明，中国的中央政府拥有强大的金融资源调配能力，他们运用这种权力重新调配资金流向和产业发展方向，从现在的偏重于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向中国内陆新兴工业城市倾斜。^①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在与 Donnithorne 的辩论中，Lardy 是赢家。

然而，仔细回想一下，也许现在论胜负还为时过早。Lardy 的观点并不是说中国的行政和经济体制中不存在本地自给自足的倾向，而是指强大而坚定的中央政府有能力逆转（也确实逆转了）这些倾向并在各个行政区域间重新调配资源。在毛泽东时期（1949~1976年），这种国家行为促进了富裕地区向贫穷和欠发达地区的再分配——这就是另一位经济学家 John Gurley 所说的“建设不发达地区”^②。然而，这种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再分配几乎完全局限于受优待的城市工业部门。中央政府没有采取类似措施或制定相应的机制对农业领域进行穷富再分配。城市工业部门的资源不会分配给农村，但农村的资源却要分配给城市。事实上，在1960年后的20多年里，国家利用户籍制度、迁移限制和定量配给等手段，阻碍了城乡之间的市场交流，并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中国由此形成了“隐形的城市壁垒”。因此，反对市场交流、倡导自力更生，加上其他的制度化倾向（如过度偏重城市工业），削弱了中国各个地区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几百年来一直存在的人员与经济联系。^③ 毛泽东时期中国的政治一体化程度高于新中国成立前，但就人口、物资和服务流动而言，中国1978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比不上1949年^④。

换言之，社会主义时代给中国留下了地方经济体努力实现自给自足的传统——从粮食、水泥、卡车到本地啤酒，各地生产的产品五花八门，无

① Nicholas Lardy:《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分布》（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

② John G. Gurley:《资本主义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亚洲问题学者通报》2（3）（1970年4月~7月），第34~50页。

③ 见 Kam Wing Chan 的《隐形的城市壁垒》（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Fei-ling Wang 的《分化与排外的社会组织方式：中国的户籍制度》（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Martin King Whyte 的《一个国家两个社会：当代中国的城乡不平等》（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0）。

④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不同，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不允许农民把农产品或手工艺品拿到城市去卖。

所不有，但行政机制带来的经济一体化是无法靠跨地域市场交流来推行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经常从先进城市调配到落后城市。因此，不平等更多是由行政地位和中共的经济侧重点造成的，而不是社会阶层、利益团体和其他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推动阶层分化的群体所造成的。

1978年推行市场化改革后，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此时的中国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趋势。一方面，很多阻止人员、物资和服务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开始弱化。农民终于首次得以脱离农业，到本地非农业企业工作，或到城市打工。面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人民贫困、商品短缺和消费者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况，具有创业精神的农民和城镇居民有的种蘑菇或养兔子，然后到其他地方贩卖；有的开办家庭餐馆；有的甚至成立公司制造玩具或运动鞋，他们的产品不仅销往城市，而且远销海外。精力旺盛的商人走遍中国，从一个地方低价购进服装、家居用品或首饰，然后高价卖到另一个地方赚钱。这些流动人口赚到钱后，总会把一部分收入寄回老家。换言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被严重阻断的横向的人员与经济联系开始复苏，市场和地域流动再次提高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一体化程度。

另一方面，改革还形成了另一种动态，而且这第二种趋势更加强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行，中共领导下的发展型国家把所有的本地“蜂窝”经济体推入了竞争的急流，以促进增长和就业，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竞争胜利者将获得重大职业发展和极为丰厚的物质奖励。地方官员竞相推出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获取大量国家投资和银行融资，吸引外国投资者。虽然各地仍然希望保留蓬勃发展的农业、水泥厂、汽车厂和啤酒公司，但他们现在也希望吸引外国投资者，建造崭新的机场，兴建酒店和游乐园，以迎合旅游业的需求。在这场竞争中，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发展得更加成功，因此各地的经济状况差异很大。在中国的新兴城市，致富很容易，这使得各地的百万富翁蜂拥而至，他们希望能进一步成为亿万富豪。同样在这些地区，政府官员、改制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民营企业大亨、国有银行和其他大型实体形成排外联盟，私下达成交易，获取巨额投资补贴，甚至明目张胆地腐败，而不是像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那样激烈竞争、勇于冒险。对普通公民而言，这种不平等竞争的严重后果是：今天，即便在中国的城市，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比，收入的多少更多的是受所在地域和所属机构的影响，而较少取决于教育背景、

职业经历和工作经验。^①

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吸引廉价流动劳动力的能力。从组装出口制成品的流水线工人，到建造摩天大楼、公路和机场的建筑工人，以及贩卖服装、打扫公寓和为城市家庭提供家政服务的人，大多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中国目前有2亿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他们通常占到大城市现住人口的30%或更多。然而，时至今日，他们在中国依然是下等公民。仅仅因为出生于农村，他们在就业、薪酬、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不能与有城市户口的居民享受相同的待遇。他们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失业者后备军”，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推动经济增长^②。

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中央政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抛开少数例外情形不谈，总体而言，邓小平及其继任者所走的路线基本都与Lardy描述的毛泽东时代背道而驰。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中央政府的政策及资源倾向于“建设发达地区”，而不再照顾落后的地区和经济部门。作为吸引外国投资的手段，1979年开始建立的沿海经济特区（SEZ）也许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口号的最佳实例。对农民和外来人口的制度性歧视一直延留至今，这代表着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主义。这种不平等得到国家的认可，旨在服务于增长引擎。与毛泽东时代后期一样，城乡差距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社会鸿沟，城乡家庭收入比在2002年就已经突破3，到2007年则进一步升至将近4，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数字。2002年，仅城乡收入差距就构成了国民收入总体不平等的45%，2007年，这一数字更升至51%。^③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自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2年以后，在胡锦涛的领导下，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公平增长的重大举措。这些举措

① 见王丰的《分割与分层：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不平等》（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一书中的讨论。此书的中文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1月出版。

② 过去十年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对滞后的外来务工人员工资开始增长。但与有城市户口的劳动者相比，外来务工人员仍然是弱势群体，这不仅仅体现在工资上，还包括其他许多福利和服务。

③ Li、Sato和Sicular主编《不平等现象在中国愈演愈烈：和谐社会的挑战》，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第32页。

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效,如取消粮食税、重建农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等^①。但问题是,中央政府一边往外给,一边往回拿,拿走的比给的还多。换句话说,在这一时期,国家政策的施行并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实际上还进一步助推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尽管这可能并非中央政府的本意。

作为发展型国家,中国近年来实施倒退政策的两个实例涉及住房和教育这两项人类基本资源的享有权。在住房方面,1995年以后,中共领导人大力推行城镇住房私有化。在此之前,拥有住房产权的大城市居民还不到10%,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工作单位租房,并支付象征性的租金。推行住房改革后,这些住房被居住者买下,单位和城市不得不给予高额补贴。拥有住房所有权后,城镇居民可以自由地出租、出售和购买住房,甚至还可以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无论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还是作为投资,这类住房需求在中国飞速增长,特别是在大城市和热门城市。由于缺乏有效的措施对出售投资性住宅所取得的资本收益进行征税,房价开始飙升(或出现泡沫?)。住房改革的结果是,到2007年,约89%的城市居民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但城市外来人口拥有房产的比例不到4%)。家庭房产现在成为很多城市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使得依靠房产收入而非工资生活成为可能,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在单位和城市享受福利住房的城里人比其他入更有资本投身这片市场,与此同时,某些社区和城市的房价又比别处上涨得更快。因此,在中国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人们获得住房收益的能力存在严重的不平等。^②在第一个实例中,由国家指令而非市场压力推动的城镇住房改革扩大了城市居民之间,以及城市居民与完全被这项政策所忽略的农民(和外来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③

① Li、Sato 和 Sicular 主编的《不平等现象在中国愈演愈烈：和谐社会的挑战》(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一书在第一章中全面讨论了多项“和谐社会”计划。在作者指导下开展的中国国家调查显示,公共医疗保险农村覆盖率从2004年的15.4%升至2009年的89.6%。

② 关于财富日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2002~2007年以住房资产形式存在的财富,相关讨论以及房产所有者统计数据见 Li、Sato 和 Sicular 主编的《不平等现象在中国愈演愈烈：和谐社会的挑战》一书的第三章。一位观察人士称,中国城镇住房私有化以及后来房价上涨的结果无疑导致了有史以来最疯狂的房地产财富积累,2010年价值超过17万亿美元[Leta Hong Fincher:《女性权益危机重重》,《异议》60(2)(2010年春季),第37页]。与中国相比,2007年美国城市居民拥有房产的比例仅为65%。

③ 农民一般住在私有的租屋中,建造新房要自己花钱,不享受住房补贴贷款。外来务工人员通常住在工厂宿舍或向郊区居民租房。

第二个实例涉及高等教育机会。从1998年开始,中国领导层实行了规模空前的高校扩招计划,十年之内,大学生的数量达到扩招前的六倍(2013年这一数字上升至十倍左右)。国家还投入巨资打造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绝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十所名牌大学,这些大学都位于大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①。这些改革产生的一些影响与我们讨论的主题有关。高校大举扩招的主要受益者是城市青年,他们在录取上享有优势,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高质量的中学教育,经过充分的学习备考;另一方面也是现行的高考制度使然(例如,北京学生享受的高考政策要比贵阳或南宁学生优越得多)。渐渐地,拥有城市户口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而农村或外来青年的受教育程度则仅为初中毕业。然而,即便是那些成功进入大学的人,今后的命运也大不相同。由于国家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大学,优势省份与弱势省份及其高校教育经费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可以获得高薪,而那些二线院校的毕业生则经常面临失业,或不得不与城市外来人口争夺工作岗位。大张旗鼓的高校扩招可能让人以为这能给中国青年创造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扩招将生存机会的不平等延续到了下一代。

我们可以从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急剧恶化的经历中吸取哪些教训呢?根据上述趋势可以得出以下几项结论。

(1) 与毛泽东时代一样,今日中国社会不平等的主因仍在于区位优势,简单地将其视为市场竞争或贫富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果其实是一种误解。

(2) 中国收入差距大、不平等现象急剧恶化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深植于社会主义的土壤之中,而没有充分体现市场力量或全球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1978年的中国尚处在地方经济单位融合不足、横向经济联系十分缺乏的状态,而由于地区竞争的影响,

① 中国1993年推出的“211工程”旨在划定100所有潜力的高校,将其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初期投入110亿元;1999年推出的“985工程”着力发展一小部分名牌大学(最终为39所),头两年投入了120多亿元;2006年推出的“111工程”旨在为中国引入大量外国科学家,以提高“985工程”大学的研究能力。关于大学拨款及招生改革在各省产生的倒退性影响,见 Hannah Waight 的《有序的不平等:改革在中国高等教育不平衡现象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社会学237论文研讨会,哈佛大学,2012年12月。关于高校扩招对扩大城乡高等教育差距的影响,见 Maocan Guo 的《1981~2006年中国学校发展与教育分层》,社会学博士资格论文,哈佛大学,2009。

再加上中央在政策和资源分配上更倾向于这场竞争中的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扶持相对较少，中国社会的地区差异进一步拉大。

(3) 市场改革促进了人口迁移，扩大了商品和服务领域的商业网络，这一系列的改革效应以及中央政府为促进公平发展而制定的计划虽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继续向优势地区和优势产业倾斜的中共政策及干预措施面前，其影响力却显得微不足道。

(4) 分析表明，中国领导层只有推行强有力的综合性改革（包括税收政策、投资模式、国有银行放贷、教育机会、户籍制度等），重新摆正发展的天平，中国急剧扩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才有可能得到遏制。只针对弱势群体出台新政和提供财政支持是不够的。2012年接任的新一届中共领导班子公开表示希望推行系统性、均衡化的改革，但是，考虑到中国在30多年里形成的既得利益、发展态势以及增长机制，这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此篇为中文翻译文章，原文“Growing Pains in a Rising China”将发表于 *Daedalus* 2014年春季刊第143卷第2期。

“增长兼顾公平”时代的终结？ 东亚社会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

王 丰

概 述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社会不平等现象激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东亚经历了一段经济增长、社会再分配的“增长兼顾公平”时期，随后，一段新的“增长与不公平共生”时期到来。这不仅造成社会分裂，也威胁民主体制，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展望未来50年，东亚这个21世纪主要的经济增长区域是否会出现更多经济社会不平等现象？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同时收入不平等现象也快速加剧。中国的经验证明，国家既可以成为不平等现象的制造者，也可以成为平等的推行者。经济发展的成果公平分配需要借助市场以外的力量，需要国家政策来应对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并创造具有长期积极意义的机会。

过去50年来，亚洲——尤其是东亚——的经济发展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短短50年，东亚变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1955年，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人口占世界人口1/4以上（26.66%），但GDP总和仅占世界9%^①。50年后，东亚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降至23.24%，但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却几乎增长到原来的三倍，达到25%。现在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均位于东亚。随着中国大陆领跑该地区

① 该数据和以下关于经济表现的数据根据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 (2009) 计算得出。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收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详情请见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2011年5月25日获取。